

九江星子出土邵雍《击壤集》《诗全集》略考

李致忠

1975年,江西九江星子县横塘公社和平大队开挖抗旱水渠时从宋墓中发现了北宋邵尧夫《击壤集》和《诗全集》。墓葬主人陶桂一。两书出土时为当地社员所获,该社员为保护此书,以草木灰慢慢将水湿吸干,而后将之置于厨房烟囱旁微温烘烤,免其继续潮湿受损。1982年收归星子县文物保管站典藏。该站见书有破损,且水分吸干后书页粘连,遂于1985年将书送至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请求予以帮助修复。笔者时任该馆善本部主任,听完来人的情况说明,亲自将此书送至本馆古籍修复室,特请手艺精湛、经验丰富的萧振邦老师傅悉心加以整修。萧师傅本着“整旧如旧”的原则,妙手回春,将其恢复成宋时蝴蝶装。

一、邵尧夫其人及其著述

邵尧夫名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学者称百源先生。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早年随父邵古徙衡漳(今河北南部),后又移居共城(今河南辉县)。雍三十岁那年,葬其亲于伊水之滨,遂为河南人。雍少年即自雄其才,读书苏门百源之上,艰苦刻砺,寒不生炉取暖,暑不打扇乘凉,夜不就席安寝,数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李之才摄共城,闻其好学,乃造庐授以物理性命、先天象数之学。北宋仁宗皇祐初年定居洛阳,西京留守王拱辰为之购置洛阳天津桥西迤旧地,建屋三十间,雍于此躬耕自食,并名其室曰“安乐窝”。时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亦退居洛阳,敬重雍之为人为学,常相过从。仁宗嘉祐中诏求天下遗逸,王拱辰以雍荐之,授将作监主簿,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皆坚辞,上不许,乃受命,但又称疾而不赴。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卒,年六十七。赠秘书省著作郎。哲宗元祐中赐谥“康节”。

邵雍是宋代理学象数体系的开创者,又是理学诗派的创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谓雍“邃于《易》数”,“歌诗盖其餘事”。《四库全书总目》引证朱国桢《湧幢小品》的话说“佛语衍为寒山诗,儒语衍为击壤集”。意思是说唐代寒山子将佛理引入诗作,宋代邵雍则将理学象数引入歌诗,这是“圣人平

易近人、觉世唤醒之妙用”^①。邵雍主张作诗不必苦吟，随口成章，直抒胸臆。他在《无苦吟》中说“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在《闲吟》中又说“句会飘然得，诗因偶尔成”，正是他对诗歌主张的自然流露。所以他写诗从不雕章琢句，只求在平实顺畅中表达深奥理趣。“弄假象真终是假，将勤补拙总输勤”（《弄笔吟》）。“知行知止为圣者，能屈能伸是丈夫”（《代书寄前洛阳簿陆刚叔秘校》）。词浅义深，饱含哲理。河南程颢久识其人，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②。雍卒，洛人哭吊者不绝于途。亲朋故旧聚谋其葬，雍子邵伯温则说：“昔先人有言，志于墓者，必以属吾伯淳。”伯淳，程颢之表字。因知邵雍与程颢两人生前交游甚密，相知甚深。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皆其理学之作。闲适则写诗，古风、律诗约有两千篇。

二、墓葬主人陶桂一

《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及《邵尧夫先生诗全集》，都出土于宋代陶桂一墓葬中。陶桂一，世居南康军星子镇长冈里，是陶渊明的二十二代孙。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传至二十二代玄孙陶桂一，虽已世居星子长冈里，其地域仍未出九江管辖的范围。陶桂一的曾祖陶元凯、祖父陶邦茂，似乎都未做过官。父陶可度，只做过迪功郎，在宋代是个从九品的小官。陶桂一生而颖悟，容止端庄。初师从朱熹的门人李燔，继师陈维新。与制置使余玠相友善。南宋宁宗嘉定末年乙酉（1225）领乡荐。理宗绍定二年己丑（1229）入太学，已为当时名公巨卿所器重。淳祐四年甲辰（1244）曾上书弹劾史嵩之，时下钳制言路，有人为其担心。陶桂一则曰：“朝廷苟以直言罪，某一死不顾。”^③透露出其忠直耿介的性格。其后张燔、黄自然交章推荐于朝，乞示优恩，使奉廷对。待朝廷命下，桂一则辞而不受。淳祐七年丁未（1247）登进士第，授武冈军军学教授。将赴任，“以祖妣年逾百，丐祠便养。丞相谢方叔、丞相吴潜力为敷奏，特改添差本军军学教授，便养承志，安舆迎侍，适如也。服除，调湖北提举常平司干官”，他却说：“禄仕以奉亲为荣，亲不及奉，吾奚仕！”坚辞不赴。颇有其先祖陶渊明的遗风。陶桂一生平廉俭自守，安贫乐道，年终衣食有馀，周济邻里乡党。并将程颢“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的教诲，书写在墙壁之上，时时提醒自己践行之。又撮录朱熹荒政要领，纳之当路，提示人们节俭备荒。尝被聘为白鹿洞书院堂长，亦领郡命而力辞。景定二年辛酉（1261）正月十六日卒。其子陶华甫、陶次华等以其“生也衣董京之衣”，故“其死也卧黔娄之衾，其敛（殓）也随生平服用，外覆以深衣而已”^④，葬事十分简朴。

①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2页。

②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28页。

③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宋故陶公提干堂长圻中记》，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3页。

④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宋故陶公提干堂长圻中记》，第234页。

据《晋书》载：“董京，字威辇，不知何郡人也。初与陇西计吏俱至洛阳，被发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时乞于市，得残碎缁絮，结以自覆。全帛佳绵则不肯受。”^①可知董京乃一安贫乐道的高节之士。《圜记》中说陶桂一“生也衣董京之衣”，无非赞扬他穿衣简朴，也是安贫乐道的高节之士。

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句下引刘向《列女传》曰：“先生死，曾子哭之，毕曰：‘何以为谥？’其妻曰：‘以康为谥。’曾子曰：‘先生在时，食不充日，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何乐于此而谥为康？’”可知黔娄也是一位安贫乐道的高节之士。《圜记》中说陶桂一“死也卧黔娄之衾”，亦无非称道他死后的寿衣像鲁国黔娄那样简朴。

清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卷九十六《深衣》，引证姜兆锡的话说：“深衣，燕居之服……。诸侯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可知“深衣”乃古代诸侯、大夫、士下午所穿的衣服，又是庶人的常礼服。“深衣”，衣与裳相连，前后深长，故称深衣。《圜记》中说陶桂一入殓之后“外覆以深衣”，意在表示他是“士”的身份，也表示这是他家居时常穿的衣服。如此一位安贫乐道，又十分崇尚理学大师程颢，乃至将他的教诲之言书写在墙壁之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邵康节与程颢交游甚密，又同是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在陶桂一心目中的地位当亦十分崇高，故“其殓也随平生服用”，而这“平生服用”的物品中便有邵尧夫的诗作，则显得十分自然。且书中不少诗旁尚有陶桂一生前朱笔点读的痕迹，使人可以遥想陶桂一当年读此书时的神情意态，凭吊他崇尚理学、修身律己的高尚品格。

三、邵尧夫《击壤集》成书及其传本

程颢《邵尧夫先生墓志铭》谓：“先生有书六十二卷，命曰《皇极经世》；古、律诗二千篇，题曰《击壤集》。先生之葬，附于先茔，实其终之年孟冬丁酉也。”（宋程颢《二程文集》卷四）表明在邵尧夫谢世的熙宁十年（1077）孟冬丁酉日之前，他所写的部分古风 and 律诗已经编辑成集，而这部诗集的名称就叫作《伊川击壤集》。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十六《康节先生传》亦说邵尧夫“有书六十二卷，曰《皇极经世》；诗二千篇，曰《击壤集》”。可证《击壤集》可能在邵氏健在时即已成书，否则其死后墓志及传记怎么会说他有《击壤集》呢？有关目录显示，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南宋末期刻本《伊川击壤集》二十卷、《集外诗》一卷，卷前有邵尧夫自序，谓“《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并谓“志士在畎亩则以畎亩言，故其诗名之曰《伊川击壤集》。时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丙午，即治平三年（1066），表明在他去世前的十一年，已经为自己的诗集撰写了序文。

其自序谓“志士在畎亩则以畎亩言，故其诗名之曰《伊川击壤集》”一语，

^①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427页。

既表达了邵氏的农耕生活,也在通达的语言中巧用了上古的典故。邵尧夫在洛阳天津桥西躬耕垅亩,自足衣食,长达三十年,以“击壤”名其诗集,典故运用得恰到好处,又反映了他一生的生活际遇。汉王充《论衡》卷五谓:“尧时,五十之民,击壤于途。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唐长孙无忌等所作《唐律疏义》卷一引周处《风土记》曰:“击壤者,以木作之,前广后锐,长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部。”其意是说尧时大道之行,父老无赋役之劳,民生无忧无虑,击壤讴歌于田野阡陌之间,自得其乐,天下太平。邵尧夫在洛阳所过三十年的农耕生活,自认如同帝尧时击壤而歌的自由农夫,因以“击壤”名其诗集。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邵尧夫为《伊川击壤集》所写的自序,是否说明那时就已有了刻本行世呢?《天禄琳琅书目》卷六著录元版《伊川击壤集》时,谓“自为之序云云,是宋时《击壤集》雍所自刊”。表明《天禄琳琅书目》的编辑者们认为《伊川击壤集》早在治平三年已为邵雍所自刊。这种理解恐怕未必符合事实。治平三年自序,不意味就是自刊,最多说明《伊川击壤集》最早可能刻于治平三年,但也不一定,因为写序之年不一定就是刻书之年。有时序写好了,书并未及时付梓;有时书版刻好了,为等某篇必要的名人序文又未及时刷印,种种情况,错综复杂,《天禄琳琅书目》如此推断,不但犯了凭序年而断定版刻的大忌,还大胆推说为“雍所自刊”,没有根据,不可遽信。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所谓南宋末期刻本《伊川击壤集》二十卷《集外诗》一卷,还保存有宋邢恕的后序,谓:“恕尝从先生学,而奉亲从仕南北,未之卒业,然于讲闻其文章,而次第其本末,则或能之。其子伯温褒袁先生之诗凡若干篇,先生固尝自序矣,又属恕以系其后,义可辞乎!元祐六年辛未夏六月甲子十有三日,原武邢恕序。”邢恕字和叔,郑州原武(今属河南)人。进士。既是邵尧夫的学生,当然比较了解邵氏诗集成书的实际情况。按照他后序中的说法,邵尧夫的《击壤集》是他的儿子邵伯温裒辑类编起来的,尧夫自己尝为之写过序,现在又由邵伯温嘱托邢恕写一篇后序,而后序落款之年是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上距尧夫去世已过十四年。如果说这时有了《伊川击壤集》的第一个刻本,大体应该是可信的。尧夫有《天津弊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一诗,也称《买园》诗:“重谢诸公为买园,买园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通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江西出土本文字上虽有出入,但“嘉祐”、“熙宁”年号的提法则同。清顾栋高《温国文正公年谱》“遗事”类,说司马光“公为康节买宅,富公(富弼)为买园,康节所藏契约,犹以二公为户,故昔人诗有云‘温公宅子富公池,并入尧夫户不知’。”也就是说大家为邵尧夫买的宅子、园子,邵是铭记于心并深表感谢的,所以才说“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嘉祐”是北宋仁宗行用的最后一个年号,熙宁是北宋神宗行用的第一个年号,中间隔了一个邵雍为《击壤集》撰写自序的北

宋英宗治平三年的年份,表明他写序之后,诗作仍然照写,这就从侧面反映出邵氏《伊川击壤集》当时可能仅是写了序,实际并未付梓。而《伊川击壤集》的第一个刻本,很可能是其子邵伯温于北宋哲宗元祐六年编刻的。

成书于南宋初期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著录邵尧夫《击壤集》二十卷,并谓:“歌诗盖其余事,亦颇切理,盛行于时。”即是说,到晁公武所生活的南宋初期,邵集是“盛行于时”的热门书。南宋后期成书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所著录的《击壤集》亦为二十卷。可见二十卷本可能是《击壤集》较早且为通行的版本。后世出现的若干传本,多数也是二十卷。

后世有没有宋本《击壤集》流传,清朝中晚期几位藏书家有过激情的讨论。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谓:“此残宋本《伊川击壤集》,只三、四、五、六卷,前一二卷已抄补,余皆失之矣。”又说:“余检《延令书目》,载此书为宋刻,与此同。《目》云二十五卷,恐是误处。盖宋代书目皆云二十卷,延令所藏奚以过之?‘五’者,衍字也。”这是第一位言及此书有宋刻者。清顾广圻《思适斋集》卷一《百宋一廛赋》“证《击壤》于泰兴”句下黄氏又注曰:“残本《伊川击壤集》,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一字,所存三至六,凡四卷而已。泰兴季氏旧物也。《延令目》云宋邵康节《击壤集》二十五卷,即此。彼时尚完,然考晁、陈及马氏著录,‘五’乃衍字。”这就是说,黄丕烈、顾广圻两位版本大家,都认为所存的四卷《伊川击壤集》是宋刻本。

黄氏藏书散出后,此本为张蓉镜所得,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张氏在跋另一所谓此书宋本时,谓此书“《击壤集》宋刻罕见。昔年由士礼居得三至六四卷,即《百宋一廛赋》所载,为季沧苇旧物”。同年十一月,张蓉镜又得汪士钟艺芸书舍《伊川击壤集》二十卷,以为是宋刻,故跋称:“此全部,首尾完整,汪氏艺芸书舍散逸,乙巳十一月得之鲍芳谷手,爱不能释,展读三复,以血书‘佛’字于空叶。惟愿此书流传永久,得无量寿。”

此本还有邵渊耀的跋文,称:“曩为芙川跋宋本《击壤集》,是为沧苇旧藏而疏于莞圃者。墨果精妙,足供秘玩。然止于三、四、五、六卷,余皆抄补。近又得此本于郡城汪氏,盖莞翁遗书多归于汪,而此则出于《百宋一廛》外者,虽刷印较后,而首尾完好,允为全璧。离之固称二难,合之更成两美矣。夫古籍仅传,以视琼玉珠犀,尤所罕近,君乃获屡奇缘,非好之笃、求之敏而能尔耶!披诵之余,惟深健羨。道光丙午岁五月癸酉,黎阳族裔渊耀谨跋。”可知,张蓉镜所得之《伊川击壤集》,不仅自己定为宋本,尚有邵渊耀跋加以附议。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著录《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宋刊本。并谓其书“前有治平丙午自序及元祐辛未邢恕序后,附《集外诗》十三首。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楮墨精好。惟《人鬼吟》卷八与卷十二重出。旧为邑中张芙川藏书。卷三册首空叶有芙川以血书‘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题其后。云《击壤集》宋刻罕见,昔年由士礼居得三至六四卷,为季沧苇旧藏。此全部,首尾完整,汪氏艺芸书舍散逸,乙巳十一月得之,爱不能释,展读三复,以血书

‘佛’字于空页，惟愿此书流传永久，无水火蠹食之灾”。表明张芙川所藏的这部所谓宋本《伊川击壤集》后又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所得。

如此热闹的讨论，又都是藏书大家、版本目录学名流，他们对版本的审定通常不容置疑。可是关于此书的版本，傅增湘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民国二年（1913），傅氏在上海见到了这四卷残书，并不认为是宋本，而将其定为“明刊本”。而在《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傅氏又进一步定其为“明初”所刊，“号为宋本”。原铁琴铜剑楼所藏张蓉镜那部宋刊完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取而细审，确非宋刻，故仍定为“明初刻本”。炒了多年的宋本，结果是子虚乌有。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著录之邵氏《伊川击壤集》，最早为元刻本，为十八卷，表明海内现存没有宋刻本。江西九江星子县出土于宋墓的《击壤集》，自然要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因为它至少可以填补此书今无宋本的空白。

清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五著录了一部“北宋本《康节先生击壤集》十五卷，六册一函”。并曰：“《伊川击壤集》，元、明皆有刊本，均作二十卷。汲古毛氏所刻源出《道藏》，而舛漏殊甚。按《四库》所收，即汲古本也。元槧本较毛本多诗五十馀首，藏书家谓为善本，余斋亦有之。此本《内集》十二卷《外集》三卷，前有治平丙午中秋自序，编次与各本迥异。序后有蔡氏弼题语一则，盖由公手订二十卷本重编为此本。卷一前后木记，题‘建安蔡子文刊于东塾之敬室’。细行密字，镌印至精。《龟山语录》所称‘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一联，诸本所佚者，此本在十二卷中。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三字不等。卷首末有‘曲阿孙育’印。丙寅初秋，获于都门。治晋斋故物也。”^①杨氏所著录并阐述的这个本子，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七也有类似的描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更说此为“宋蔡弼子蔡子文刊本，题《康节先生击壤集》，分内（外）集，与世行本迥异。”如此斩钉截铁被定为“北宋刊本”的这部十五卷本《击壤集》，也被傅增湘怀疑，并说“杨《目》题《康节先生击壤集》十五卷，……杨氏称为北宋本，然据蔡氏弼题语，仍从二十卷本重编者，则其在二十卷本后可知，谓为北宋本，未之敢信。”^②且这个本子从海源阁流出后迄今渺无踪迹，傅氏的怀疑已无从得到证实。

四、宋墓出土的《击壤集》与《诗全集》

2012年3月，江西美术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当年陶桂一墓出土的《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和《邵尧夫先生诗全集》（图见封二），并同时出版了江西省社科院胡迎建同志的校注整理成果。该书卷前有原任星子县县委副书记、星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陶勇清所写的序文；又有胡迎建所写的《校注前言》。《序》称：

^①杨绍和编撰、周叔弢批注：《周叔弢批注楹书隅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635-636页。

^②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第229页。

“经专家鉴定,该书为北宋刻本,属国家一级文物、海内孤本。”《前言》称:“我推断,墓中出土的版本应在元丰年间(1078-1085)或稍后。”这两个结论令人为之惊诧。须知,能够传至今日的北宋书刻,可谓吉光片羽,寥若晨星。陶墓出土两书若真是北宋刻本,会引起业界的极大震动。

前引杨氏《楹书隅录》所录《康节先生击壤集》,无论其是否真为北宋本,还是后世的翻刻本,其所记录的该书分《内集》十二卷《外集》三卷;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三字不等;卷一前后各有木记,内容为“建安蔡子文刊于东塾之敬室”等客观信息,应该是可信的。这些东西后人造假是造不出来的。江西九江星子县横塘乡出土的《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卷端第二行上题就有“内集”二字,而下题则是“敬室蔡弼重编”字样。“内”与“外”是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体。既然标示出“内集”,不言而喻就应该必有“外集”,否则“内集”就失去了标出的相对意义。只是出土本内、外集的卷数分配已非《楹书隅录》所记载者。但出土本的邵氏《击壤集》却以实物资格,证实了宋代确曾有过分内、外集的《击壤集》,否则出土本《击壤集》卷端第二行上题就不会出现“内集”字样,既出现了,就证明在出土本之前确曾有过分内、外集的传本,并表明出土本的《击壤集》很有可能就是重编这个传本所由生。但内、外集本的书名为《康节先生击壤集》,出土本的书名则为《重刊邵尧夫击壤集》,两者截然不同。

杨《录》谓“序后有蔡氏弼题语一则”,然题语为何,杨《录》失载,而出土本卷端第二行下题则是“敬室蔡弼重编”,因推知杨《录》所省略者,很有可能就是这句话,或是类似的话。只是蔡弼为何人,行实无考。而杨《录》所说卷一前后“建安蔡子文刊于东塾之敬室”的木记,则进一步告诉人们蔡弼所重编的《康节先生击壤集》,有建安蔡子文刻梓于“东塾之敬室”的题记。然蔡子文又是何人,事迹更难稽考。惟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说“宋蔡弼子蔡子文(亦作蔡文子)刊本,题《康节先生击壤集》,分内(外)集,与世行本迥异”。这种标注的依据是什么,邵章并未明示,因而令人既不敢轻信,也不敢断然否定。蔡弼与蔡子文若真是父子关系,则其父重编二十卷本《伊川击壤集》为《内集》十二卷《外集》三卷的《康节先生击壤集》,儿子将其刻于自家的“东塾之敬室”,情理上倒也说得过去。

宋陈祥道《礼书》卷四十九《塾》条引“《说文》曰:‘闾里门也’。《尔雅》曰:‘门侧之堂谓之塾’。……《食货志》曰:‘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盖古者合二十五家而为之门塾,坐父师、少师于此,所以教之学也。坐里胥、邻长于此,所以教之耕也。《书》言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左塾者,东塾也。里胥尊于邻长,而里胥在右塾,邻长在左塾,则右塾者,西塾也。’”可知古代所谓的东、西塾,不过是学生受教育、学知识、学耕稼的家塾。明李濂《嵩渚文集》卷五十三《东西塾记》曰:“吾家学稼堂之旁左右夹室各四楹,因以左为东塾,右为西塾,命子弟肄习其中,延师以教,端楷模也。”可知“东塾”者,乃家塾之名也。蔡子文将其父所重编的

《康节先生击壤》刊于“东塾之敬室”，实际就是由他们的家塾所付梓。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三家注《史记》卷首《集解序》后镌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双行墨印牌记；《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所列注家姓氏之后亦镌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双行墨印牌记，跟“建安蔡子文刊于东塾之敬室”完全是一种性质，证明它们无非都是家塾刻本而已。

说到蔡氏东塾，不能不令人联想起蔡梦弼东塾所刻的二家注《史记》，目录后镌有“三峰樵隐蔡梦弼傅卿校正”一行；《三皇本纪》后镌有“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乾道七月（月当是年之误）春王正上日书”二行；《补史记序》、《六国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乐书》、《历书》后均镌有“建安蔡梦弼傅卿谨按京蜀诸本校理置梓于东塾”二行；《殷本纪》后镌有“建溪三峰樵隐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二行；《五帝本纪》、《周本纪》后镌有“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亲校谨刻梓于望道亭”二行。这位蔡梦弼，与蔡弼、蔡子文有无关系，不得而知。但他们都姓蔡，都是建安人，都用“东塾”名义刻书则是事实，因疑他们有宗亲关系，甚至是同一家人，只是谁为长辈谁为晚辈，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国家图书馆藏有宋刻蔡梦弼所撰《杜工部草堂诗笺》，成书在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表明此时他仍健在于世。乾道七年（1171）就能以蔡氏“东塾”名义刻二家注《史记》，其时年龄怎么也在三十左右，三十三年后完成《杜工部诗》会笺时，年龄至少应在六十以上。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蔡梦弼可能是蔡弼、蔡子文的晚辈。若果真如此，则蔡弼、蔡子文的生活年代则当在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这样蔡梦弼之名也就好理解了，原来他的先人是蔡弼，“梦弼”不过是他对先人的慎终追远而已。但这均属推想，不能算作结论。但有一条可以结论，即蔡弼、蔡子文、蔡梦弼肯定有宗亲关系。这有待他们这一支家谱的出现和发掘，以便做出明确的结论。

九江星子出土本《击壤集》，虽能证实邵氏《击壤集》确曾有分为内、外集的传本出现，但出土本却不是这个版本的原刊。原因是出土本与杨《录》描述的版本有三方面的不同：其一是书名不同，前述已知蔡弼重编的《击壤集》称为《康节先生击壤集》，出土本的卷端题名则是《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其二是行款不同，杨《录》本是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三字不等，而出土本则是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其三是卷数不同，杨《录》本为《内集》十二卷《外集》三卷，凡十五卷，而出土本则只有七卷。这三方面的不同，证明出土本可能是在《内集》十二卷《外集》三卷基础上又重新加以编纂而成的另一个版本，所以它的书名才题作《重刊邵尧夫击壤集》。这个本子的重编者为谁、刻梓者又为谁，虽很难稽考，但最大的可能是其时的书铺子所为。

出土本《击壤集》为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卷一收诗五首；卷二收诗三十四首；卷三收诗三十三首；卷四收诗三十一首；卷五收诗三十八首；卷六收诗三十七首；卷七收诗三十九首，总为二百一十九首。诗题多带“吟”字，似有类分之意。此本之改编，很有可能以蔡弼重编《内集》十二卷《外

集》三卷的传本为祖本,故卷端第二行上端仍题有“内集”,下端仍题有“敬室蔡弼重编”字样,这显然是重编之后所遗留的祖本痕迹,实际编排已全失祖本的原貌。二十卷本《伊川击壤集》收诗一千三百零七首,此才二百一十九首;《内集》十二卷《外集》三卷本《康节先生击壤集》由于世无传本,其收诗多少不得而知,但由于它是在二十卷本基础上加以重编而成,估计收诗也不会太少。而此出土本《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只有七卷二百一十九首诗,显然是重编的重编,绝非蔡弼所初编者。而这位重编者为谁,推想仍然是闽建的书铺子,而最大的可能是蔡氏的后人。宋代的家塾刻书,与其同时代的坊间刻书,起初是有一定区别的,但由于家塾、书坊刻书都是要经销的,所以家塾极易沦为坊间书铺子,当年赵万里先生就把家塾刻书归并到书铺子一类。

书铺所得《康节先生击壤集》大概只剩内集七卷二百一十九首诗的规制,卷帙太小,难以立世独行,故只好再编一部《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以扩其卷帙和收诗容量。然《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以下简称《诗全集》)也只有九卷,其中卷一收诗七十三首;卷二收诗三十三首;卷三卷四实际只有一卷,收诗三十二首;卷五收诗四十二首;卷六收诗三十四首;卷七收诗三十二首;卷八收诗四十三首;卷九收诗三十九首,总为三百二十八首。邵尧夫一生有诗两千篇,仅收三百二十八首诗,就敢以《邵尧夫先生诗全集》名之,这也是南宋闽建书铺子刻书常用的虚张声势的伎俩。如黄善夫家塾之敬室刻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魏仲举家塾刻的《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魏齐贤富学堂编刻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既无百家,更无五百家,都是在书名上夸张其词,发挥广告效应,用以招揽生意,以便从中渔利。《重刊邵尧夫击壤集》、《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两书叠加,总共收诗不过五百四十七首,也仅是邵尧夫全部诗作的四分之一强一点。这大概就是《邵尧夫先生诗全集》编刻的内在原因。但两书的版式都是十二行二十字的款式,字体风格亦大体相同,因此它们都是重新编刻的本子。

之所以推定此两书为书铺子所编刻,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些现象也是书铺刻书常有的特征:一是两书均无序跋,这就跟官府刻书、私宅刻书不大相同,原因是他们不愿花钱请序,也不愿说明编刻的具体缘由,因而不写序跋。二是两书均无刻工,与官刻私雕也很不相同,官刻私雕,无论倩工上门开版,还是外包给刻印工人承揽,工头都要实行个人责任制,以便问责和计件付酬,故多有刻工之名,而书铺子常是自雇一两位刻、印工人,自家编刻之书就无须将刻字人的名字镌雕上去。三是两书讳字较少,此与官刻私雕也不尽相同,南宋理宗以前,官刻私雕讳字是比较严格的,包括赵宋立朝以来的已祧之讳,几乎均行回避。至理宗,礼部虽仍重整《礼部韵略》,公布所讳之字,但已主要是为举子应试避免犯讳,刻书避讳已不那么严格。书铺子刻书就更加不注意这些繁琐的讳法,讳字出现的几率就更少。但遇到“桓”字,则仍随世情,照避不误。出土两书讳字极少,仅见的几处讳字仍是这个“桓”字,这就同其他南宋所刻之书大致

相同了。至若有避有不避,那是写样时疏忽所致,不说明它不避。南宋刻书普遍避“桓”,也许是因为钦宗即位没多久便成了金人的俘虏,与他父亲宋徽宗赵佶一起到北国倍受凌辱,人们对他表示无限的同情,故在刻书时凡遇他的御名、嫌名之字多行回避,故见到“桓”字缺笔,不能就说成是北宋刻本,反而表明它已是南宋刻本。四是南宋,特别是南宋后期,书铺子刻书多用简体、俗体、异体字,原因无它,就是这些字笔画少,结体简单,写样、刻字都可以节时省工,减少工本,降低售价,赢得市场,以便获利。此两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如万、齐、渊、尽、争、蛮、与、离、变、献、挤、乱、厉、迁、爰、号、厘、数、执、尔、刘、楼、栾、弃、归、战、庙、国、举、递、体、学、宁、辞、兴等字,非俗即简,这是南宋后期,特别是元代闽建书铺刻书的常见现象,因而也就形成此期书铺刻书的一个明显特征。上述种种现象告诉我们,南宋陶桂一墓所出土的两部邵尧夫诗集,可能是陶氏谢世(1261)前若干年,福建书铺子所编刻。说其为北宋刻本,证据不足,难以置信。

五、宋墓出土《击壤集》与《诗全集》的价值

书铺子刻书,在材料搜采、去伪存真、校勘精粗及文字准确程度等方面,固不可与官刻、家刻相提并论,但书铺子在嗅觉市场、捕捉读者心理等方面常能得风气之先,因而在内容取舍、编排形式、出版方式等诸方面都敢于创新,从而赢得市场,获利广传。因此我们对书铺子刻书不能全盘小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宋墓出土的《击壤集》和《诗全集》,虽很可能是南后期闽建书铺子所编刻,但对其版本的优劣短长,诗歌内容的学术价值,就要给予具体而如实的评价。

前边已经说过,邵尧夫诗集在宋代有过二十卷本和分内外集的十五卷本流传,但都未能穿越时空,传至今日。而《重刊邵尧夫击壤集》七卷、《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九卷的出土,填补了邵氏诗集迄今无宋本传世的短板,这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写诗是邵尧夫的馀事,但诗言志,歌抒怀,透过他的诗作,可以认知他的生活情趣、人生态度、处世哲学。邵氏诗作常能以敏锐的目光透视事物的本质,而后用平和的心态、通俗的语言、诗歌的形式讲出其深奥的哲理。所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他的诗集“盛行于时”。古人诗作的流传,常是先为师友、同行、同僚间传诵,而后新作平添,旧作删润,日积月累,愈传愈广。然而到要编辑成帙时,又常要广泛搜集,重新润饰,认真剪裁。邵尧夫一生作诗两千篇,收诗最多的二十卷本《伊川击壤集》,不过收录一千三百多首,还有七百首左右的诗篇流传世间或部分散逸,这就为旁人后世再编其集时留下了重新搜采和甄选的馀地。出土本《击壤集》和《诗全集》,应该就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编刻而成的。吴恽同志所撰《〈邵尧夫先生诗全集〉的版本及文献价值》一文拣出二十九首诗为明本所失收,胡迎建同志说是有二十八首失收,就更是出土本的价值

所在。这些诗不仅仅具有辑佚价值，也是人们进一步了解他人生态度和生活哲学的凭借。“无行少年子，京都来往频。功名一生事，歌酒十年春。有数黄金尽，无情白发新。朋从消散尽，赢得病随身。”（《无行吟》）这既是对没有正确人生观而又追求功名利禄、潦倒场屋者的同情与批评，也是对后来仍在执迷不悟者的善意规劝。“富贵如将智力求，仲尼年少合封侯。世人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府愁。”（《富贵》）这虽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翻版，但也是对使心弄计、投机取巧追求荣华富贵者的警示。“弟兄尚路人，它人安可从。人心方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嶷峰。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鲍死已久，何人继其踪。”（《人心》）这是作者饱经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后的感悟，也是对其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鞭笞。“六十残躯鬓已斑，缪称仙术有□□。时来孺子成功易，势去圣人为力难。虽则筋骸□康健，奈何情意已阑珊。着身争处明开眼，三十年来看世间。”（《六十岁吟》）这是诗人六十年人生经历的总结，劝诫为人做事要顺时应势，不应违背规律。这些极富哲理的诗篇，举不胜举，不但可以辑补邵集传世本的遗缺，也更丰富了邵氏的思想宝库。

这二十几首他本失收的逸诗中，还有的属于纪事诗，更具史证价值。如传世《伊川击壤集》卷九收有一首《闻少华崩》诗：“变化无踪倏忽间，力回天地不为难。若教施展巨灵手，岂止轩腾少华山。六社居民皆覆没，九泉磐石尽飞翻。尧尧一句能收采，尧舜之时自可攀。”显然这是言其地震之烈，而未言地震发生的时间。而这二十九首逸诗中又有《闻少华崩》一诗：“熙宁壬子岁，少华忽然崩。七社民俱列，九泉神不宁。普天无骇□，旷古来（疑为“未”）之聆。变理阴阳者，如何略不惊。”明确告诉人们这次少华山地震，发生在熙宁五年壬子（1072）岁。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九记载熙宁五年九月“少华山崩。知华州吕大防言：‘少华山前阜头谷山岭摧陷，其下平地东西五里、南北十里溃散坟裂，涌起堆阜，各高数丈若堤岸。陷居民六社，凡数百户。林木庐舍亦无存者。’”吕大防，字微仲，陕西蓝田人，时任华州知州。他的奏言，与邵氏之诗所记载的时间及所描述的震况大同小异，证明了邵诗的史证价值。此次地震发生前，“并山之民言数年以来，谷上常有云气，每遇风雨即隐隐有声。是夜初昏，略无风雨，山上忽雾起，有声渐大，地遂震动。不及食顷，即有此变”（《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九）。看来，早在少华山发生地震前数年就有征兆，只是人们不知其所以然而未加留心而已。

当然，对出土本《击壤集》和《诗全集》的诗篇也不能毫无分析地全信，如有文章据《诗全集》中《生男篇》“当日吾年四十五，始方生汝为人父。养育教训诚在我，寿夭贤愚计于汝。吾今耆年时七十，尔正方刚二十五。吾教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的诗句，怀疑邵尧夫卒年并非六十七岁，而应当在七十开外，从而抬高《诗全集》的校勘价值。这恐怕值得考量。这首诗在《伊川击壤集》中谓为《生男吟》，其下标注“嘉祐二年”。诗句为：“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前见汝

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

《伊川击壤集》的这首《生男吟》写于嘉祐二年（1057），如果将这一年作为他的生儿年，则邵尧夫时年当为四十六周岁或说是四十七虚岁，与他自己所称四十五岁生儿“始为人父”在时间上不符，因此这首诗当不是写在生儿的当年，而是写在儿生后的第三年，即嘉祐二年（1057）。以此前推，其长子邵伯温当生于至和二年（1055）。这一年，邵尧夫行年正好是四十五虚岁。有了如此的考辨后，再回过头来读“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就觉得它是回忆性的口吻，而非当年写实的口气。若是写实，就应是“我今行年四十五”了。如果上述理解可通，则邵伯温的生年就不该是嘉祐二年（1057），而应是至和二年（1055），但迄今所能见到的词书，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说邵伯温生于嘉祐二年（1057），似当考虑修改。

当然，要考查邵尧夫的生卒年，最可靠的材料恐怕不是这些诗句，而应是程颢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前引宋程颢《二程文集》卷四程颢所写之《邵尧夫先生墓志铭》，谓“熙宁丁巳孟秋癸丑，尧夫先生疾终于家”。丁巳即熙宁十年（1077）。清陈弘谋所作《宋司马文正公年谱》载熙宁十年丁巳，公年五十九岁，“秋七月癸丑，康节先生邵雍卒”。亦证实邵尧夫确是卒于熙宁十年。《墓志铭》又谓“先生生于祥符辛亥，至是盖六十七年矣”。辛亥即大中祥符四年（1011）。我们据此加以推算，其生儿那一年邵尧夫确是四十五虚岁，其人生确实虚度六十七年。这篇《墓志铭》可靠程度如何，如下内容值得注意。邵氏《墓志铭》作者程颢，乃邵氏的生前好友，并且过从甚密。据《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载：“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葬事外庭……。既葬，颢为铭墓。”而其《墓志铭》亦讲邵雍死后，亲朋故旧“又聚谋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志于墓者必以属吾伯淳’。”伯淳，即程颢的表字。可见程、邵的关系绝非寻常。清李清馥《榕村谱录合考》卷下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一天退朝后，尝传兵部侍郎李光地至御榻前，问他程、邵之学的渊源与区别，李光地则奏曰：“程、邵渊源虽微有不同，然极相推服。程颢常称邵雍‘为内圣外王之学’，邵雍必欲以《志铭》属程颢。皆相推服之至也。”如此相知相好的朋友程颢为其撰写《墓志铭》，难道连卒年还会搞错？不可能。生年也不应有问题，因为撰写墓志之前后，关于逝者的生年是要求证于家属的，通常亦毋庸置疑。由此返回头来再读出土本《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中的《生男篇》，就会觉得其诗不仅在文字、诗风上不似邵尧夫的作品，就其卒年而言就更加不可信。所以这首诗很可能是伪作或伪改，被书铺子搜集来阑入其中；或干脆就是书铺子伪造，以之来吸引读者，促进销售。可是这样一来，给后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至若引证《自咏》中“年将七十待所为”；《闲吟》四首中第二首：“予年四十七，已甫知命路，岂意天不绝，生男始为父。且免散琴书，敢望大门户。万事尽如此，何用过忧惧”等诗句，说他“自相矛盾”，恐怕也未必是事实。“年将七十

待所为”，正说明他还未到七十，六十六七岁也可以说“年将七十”，无所谓自相矛盾。孔夫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已四十七岁的邵尧夫，当然可以说“已甫知命路”，哪里晓得天意不断其后，所以才使之“生男始为父”。这完全是四十七岁时的随想之作，无非是劝人什么事都不要过于忧愁着急，顺乎自然，都会有结果的。并不是说四十七岁那年才“生男始为父”。总之，对出土本的《击壤集》和《诗全集》，特别是对他本所无的二十九首逸诗，第一是要考查其真伪，第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轻信，不轻否，如实表述它的价值。

前述吴恽文章及陶勇清《序》、胡迎建《校注前言》，都提到此书的文字价值，《序》谓“通过文字比较发现，至今通行的少量简体字在宋代刻本中已使用，这对中国文字简化的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前言》中谓“在文字学上，两种宋版书也有其价值，一是可作避讳学的研究；二是有的异体字写法与通常的异体字不同；三是诗集中可见在宋代就流行一些简体字、俗体字（举例略）”。其实出土两书未必有这方面的价值。众所周知，中国汉字的发展演变路径，是笔画删繁就简，字体由圆变方。加之自古就有的同音假借和民间用字图简的趋势，简体字、异体字、俗体字老早就不断出现。现存五万件的敦煌遗书中，这种简、异、俗体字就屡见不鲜。而敦煌遗书是公元四世纪至十世纪的遗物，那时就已出现的简、异、俗字，到南宋后期的书铺子刻书更加变本加厉地加以使用，并不断自造简字，目的无他，图的就是减少笔画，舒解结构，非但可以节工省时，降低成本，还可以因笔画减少，结构简单，减少或避免刻坏文字再挖补重刻的附加劳动，从而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为此，它成了南宋后期一直延续到全元，乃至明初书铺刻书的特有风格，因而也就成了人们考察官刻、私雕、坊刊的凭借。当然，并不是说官刻、私雕之书就一个简体字也不用，但用的较少。尤其是官刻的正经正史，比较严肃，极少见到简体字。至若避讳学研究方面的价值，出土两书较之现存其他宋版书，几乎不具备任何代表性。若有兴趣，可以到省图书馆去看看《中华再造善本》，那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共识。还是那句话，不是北宋本不见得就降低价值，书铺子编刻也不见得价值就低，一切从实际出发，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本身就是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邵堯夫先生詩全集卷第二

安樂窩

安樂窩中快活人開來四物幸相親一編詩逸蕙花
月一卷書囊壓鬼神一炷香清衡字泰一罇酒美湛
天真太平自度何多少惟願君王

和彌

先生自蘭客西幾樂道安閑絕世

先生亦

起猶甘窮巷寂先依母穿百代當榮
造微珍重相知或相訪醉和司

和

安樂窩中名隱君腹藏姬

重刊邵堯夫擊壤集卷第一

內集

觀大基吟五言

敬室 蔡弼 重編

人有精遊藝手嘗觀奕其筭餘知造化着外見幾微
好勝心无已爭先意不低當人盡實主對面如
在夷財利激于衷喜怒見于顏生殺在于手与
奪指于順戾不殊冰炭和不作填義不及朋友情
不通夫妻珠玉出懷袖龍蛇走肝脾金湯起鑄組劍
戟交解幃白晝役鬼神平地蟻蟻空江變雷電
重陸海誅鯨鯢寒暑同舒徐春明共敵虧山河燦興
地星斗會璇璣因觀地勢翻為龍騰躍高卑
易或製反覆莊子心一判利害不兩得卷舒

文见第 8 页

謹入以報

七月甲子日交相并書于西神光

五兄大人履任後宜當為日分校系開之喜

矣中現駐金陵料理開務應將外界公

事先行拆撥是以金刑帳碼等項

等時未及字出不多述數項

名要更

王希中書

再激言百金至并送

呈惟彩

如星樞友中仍暗過送新共二數舊共三四五

不等均令招并親自送往如彭共不知住址

委已略附該并聯俟

指而辦理也敬候一函附彩

飭為呈呈劉原堂信仍煩貴記分文又及

文见第 137 页